



传统史学理论的 终结与嬗变

罗炳良 著

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各种经验教训迫切需要总结，加之清廷文化专制政策的钳制和对考据学的扶持倡导，于是形成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传统文化运动。这种清理和总结前代学术文化的思潮，到乾隆、嘉庆年间臻于极盛，形成了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乾嘉考据学发展趋势，历史考证学是其主要分支，产生出了不少考史学家，撰写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更是汗牛充栋。在考证历史事实和考证史书讹误两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个是文史理论总结趋势，产生出以浙东学派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批评性与总结性相结合的史学思想，对二世纪以前的整个中国史学做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其重要特征是以探讨史学理论为主而兼及历史理论，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两个发展趋势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与嬗变的特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中外史家的关注。中国学者朱维铮认为：清代乾嘉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端，标志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与嬗变。

泰山出版社

传统史学理论的 终结与嬗变



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

罗炳良 著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
罗炳良著. - 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1

ISBN 7-80634-472-1

I. 传... II. 罗... III. 章学诚(1738~1801) - 史
学理论 - 研究 IV. B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432 号

著 者 罗炳良

责任编辑 冯文静

装帧设计 路渊源

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

——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

出 版 泰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23466

发行部(0531)82025510 82020455

网 址 www.tscbs.com

电子信箱 tscbs@sohu.com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50×1168mm 32K

印 张 11.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34-472-1

定 价 22.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章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	(15)
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	(16)
二、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思想 ...	(27)
三、护惜前人学术成果的思想	(43)

第二章 章学诚的朴素辩证观念	(54)
一、存在和思维彼此互动观念	(55)
二、学术思潮循环衰盛观念	(61)
三、典籍发展“奇”“腐”转化观念 ...	(76)

第三章 章学诚的史学史意识	(89)
一、中国史学的源头	(90)
二、“史学”范畴的内涵与演变	(107)

三、《史官传》构想在史学史上的意义	(118)
第四章 章学诚的史学性质理论	(124)
一、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	(125)
二、“六经皆史”学说	(136)
三、“志属信史”主张	(147)
四、“谱为史体”识解	(172)
第五章 章学诚的史家素养理论	(188)
一、史学家法与通史家风	(189)
二、“作史贵知其意”	(204)
三、以“心术”论“史德”	(212)
第六章 章学诚的史学功用理论	(228)
一、对义理史学和实证史学的辨正	(229)
二、“以史明道”的功能	(247)
三、“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	(263)
第七章 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理论	(273)
一、关于史书编纂体裁演变的认识	(274)
二、关于史书编纂义例发展的认识	(279)
三、关于史书编纂体例创新的探索	(298)
第八章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319)
一、实事求是的批评方法	(320)
二、多闻阙疑的批评方法	(334)
三、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345)
后 记	(362)

导 论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各种经验教训迫切需要总结;加之清廷文化专制政策的钳制和对考据学的扶持倡导,于是形成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传统文化运动。这种清理和总结前代学术文化的思潮,到

论和总结前代学术文化的思潮,到乾隆三朝达到顶峰。这种思潮在乾隆三朝达到顶峰,并由此而引发了乾隆三朝的文化专制政策。这种思潮在乾隆三朝达到顶峰,并由此而引发了乾隆三朝的文化专制政策。

第八章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319)

- 一、实事求是的批评方法 (320)
- 二、多闻阙疑的批评方法 (334)
- 三、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345)

后 记 (362)

做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其重要特征是以探讨史学理论为主而兼及历史理论,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两个发展趋势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终结与嬗变的特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中外史家的关注。中国学者朱维铮认为:清代乾嘉史学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标志着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与嬗变。

导 论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各种经验教训迫切需要总结;加之清廷文化专制政策的钳制和对考据学的扶持倡导,于是形成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传统文化运动。这种清理和总结前代学术文化的思潮,到

第六章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319)

- 一、实事求是的批评方法 (320)
- 二、多闻阙疑的批评方法 (334)
- 三、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345)

后 记 (362)

注定了其学问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在乾嘉年间默默无闻,一生穷困潦倒,却又性情孤傲,命运坎坷。但是,人生的挫折和治学的寂寞也造就了他不甘屈服世俗,而勇于另辟学术蹊径的顽强性格,生命不止,著述不辍,不仅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中国史学开辟出一方新天地,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史理论和治学方法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章学诚少年时代资质并不聪明,“二十岁以前,性绝骀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①。而且身体素质也不是很好,“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②,因体弱多病,时常废学。十五六岁以后,知识渐开,好泛览群书,在父亲章铤的启发诱导下,开始对史学发生兴趣,曾经在塾课之余取《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试图按照纪、表、志、传体例编撰纪传体裁的《东周书》,已撰成百余卷,后为塾师发觉而终止。这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章学诚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不谙世故,屡屡受挫。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始余入监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然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决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不过五七人而已,余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余人齿;同舍诸生,视余若无物。”^③当时只有沈业富、朱筠和朱蔡元等极少数人了解章学诚,赏识其识解。沈业富俾其坐馆从事铅槧,朱蔡元荐其与修《国子监志》,朱筠则招其入门受业。章学诚从朱筠问学,不仅得到朱筠言传身教,而且得交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洪亮吉等知名

① 《文史通义》(《章氏遗书》本,下同)外篇三《家书六》。

② 《章氏遗书》卷二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③ 《章氏遗书》卷一九《庚辛之间亡友列传》。

学者,学业大有长进。这一时期他治学的重点仍然在史学,“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计部二十有三,非数十金不能致,则层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①。在艰难购书的基础之上,章学诚开始深入研究纪传体史书。他说:“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②在京的十余年中,章学诚虽然屡试不第,蹭蹬科场,饱受世人讥讽,被人“视为怪物,诧为异类”^③,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从未动摇治史的决心,在学业上逐步趋于专精和成熟,为其文史撰述打下了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章学诚经过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然而他自知性格与社会格格不入,不敢走仕途之路,直至逝世,都以教读与著述为生。他晚年回忆自己“屡困棘闱,晚登甲第。……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文墨千人,前后奔走,几三十年”^④。由于常常失业,生计无着落,不得不奔走各地谋生,足迹自京师而外,北到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西到陕西华州(今华县),南到湖北武昌府(今武汉市)、安徽亳州(今亳州市),流离患难,倍尝艰辛。他后来回顾说:“自庚辰始赋远游,于今三十六年。余兹六尺之躯,亦备历崎岖险阻,颠倒狼狈,极人世可悲可愕之境,非一日矣。”^⑤在这三十余年中,他曾经主讲永平书院、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定武书院、文正书院,为地方官吏撰修《天门县志》、《永清县志》、《和州志》、《亳州志》、《湖北

①⑤ 《章氏遗书》卷二二《瀚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②③ 《章氏遗书》卷二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④ 《章氏遗书》卷一七《柯先生传》。

通志》以及《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等书。坎坷多难的生活,寄人篱下的滋味,使得章学诚于“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①;加以“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知己落落,不过数人”^②,饱受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反而迸发出向艰难困苦的环境抗争的极大勇气,经常是“江湖疲于奔走,……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③,始终不断地坚持史学义例和校讎心法的研究。尤其是晚年双目失明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著述之事,口授情人代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章学诚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积累治学经验,总结出校讎义法和文史理论。他自称“鄙于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④,注重把握各家的著述宗旨;又特别声明“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⑤。正因为具备这种学术素养,所以治学非常突出“鄙人所业,文史校讎,文史之争义例,校讎之辨源流”^⑥的特色,撰写出《文史通义》和《校讎通义》两部成一家之言的文史批评理论著作。章学诚在这两部名著里表明了“从事于文史校讎,盖将有所发明”^⑦的学术旨趣,形成了治学贵著述成家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

① 《章氏遗书》卷二九《与史余村论学书》。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

④ 《校讎通义》(《章氏遗书》本,下同)外篇《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

⑤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⑥ 《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出版,下同)佚篇《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⑦ 《章氏遗书》卷二九《上辛楣宫詹书》。

古史学辟其藁芜。”^①在这部书里,最显著的特点是阐明史学家法和为史之意,辨析各种史书体裁义例,抨击治学各分畛域的积弊,宣扬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同时,章学诚还把校讎学也纳入广义史学的范畴。他指出:“学术同堂而异室者,知之不易。北宋史才,尹氏之识,二刘之学,已各不相蒙;南丰曾氏史学,本于陈父子,及校讎之学,非撰著之市也。”^②不仅指出尹洙、刘敞、刘攽、曾巩、陈亮、陈淳等史学家的治学特点,而且指出“学术同堂而异室者,知之不易”。

章学诚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积累治学经验,总结出校讎义法和文史理论。他自称“鄙于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③,注重把握各家的著述宗旨;又特别声明“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④。正因为他具备这种学术素养,所以治学非常突出“鄙人所业,文史校讎,文史之争义例,校讎之辨源流”^⑤的特色,撰写出《文史通义》和《校讎通义》两部成一家之言的文史批评理论著作。章学诚在这两部名著里表明了“从事于文史校讎,盖将有所发明”^⑥的学术旨趣,形成了治学贵著述成家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

① 《章氏遗书》卷二九《与史余村论学书》。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

④ 《校讎通义》(《章氏遗书》本,下同)外篇《与胡锥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

⑤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⑥ 《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下同)佚篇《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⑦ 《章氏遗书》卷二九《上辛楣宫詹书》。

及其史学成就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学者则较早地开始关注和研究章学诚。20世纪中国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和研究章学诚,显然是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刺激与影响。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致有人把它称之为“章学诚现象”。因此,回顾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章学诚史学研究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将会有助于深刻认识20世纪章学诚史学研究的得失利弊,促进未来新的学术研究和探讨不断深入。

(一)关于章学诚著作的整理与刊刻。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在生前曾经刊印,但因该书撰写时间前后历时三十年之久,某些计划撰写的篇章直到去世也没能写出,所以只能选刊一小部分,而无法包括全部,刊刻完本。由于章学诚生前未及编定篇目,临终前委托浙江萧山学者王宗炎校订。他校订的《文史通义》篇目为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其中外篇内容为议论、序跋和尺牍。王宗炎逝世后,章学诚次子章华绂认为“谷旌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①,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刊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并附《校讎通义》三卷,刊刻于河南开封,是为大梁本。章华绂刻本内篇已和王宗炎校订篇目有出入,外篇内容则完全不同,收录章学诚所撰写的各种方志序例。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于1920年根据会稽徐氏抄本刊印《章氏遗书》,但未能包括章学诚的全部著作。1922年,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根据王宗炎所定篇目,又广为搜集,刊刻《章氏遗书》50卷。其内容包括《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信摭》、《乙卯札记》、《丙辰

^① 《文史通义》(大梁本)章华绂序。

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各一卷，《永清县志》十卷，《和州志》三卷，《历代纪年经纬考》、《历代纪元韵览》各一卷，书后另有《补遗》、《附录》和《校记》，尽管方志内容较多散佚，难成全帙，但仍然比较全面地包括了章学诚的著作。从此，《文史通义》除大梁本之外又有另一个版本，即《章氏遗书》本。

20 世纪对于章学诚著作的整理，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935 年叶长清的《文史通义注》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一印行，1970 年又由台湾广文书局出版。1956 年依据《章氏遗书》本整理的《文史通义》，由当时设在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出版。1948 年叶瑛依据大梁本《文史通义》整理著成《文史通义校注》，于 1985 年由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整理吸收了叶长清注本的长处，同时利用《章氏遗书》本对大梁本加以校订、注释，旁征博引，资料翔实，对于世人理解《文史通义》很有裨益。1985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嘉业堂刻本《章氏遗书》，另据其他各种抄本增补十余篇佚文，题名《章学诚遗书》，是迄今收录章学诚著作最为丰富的版本。仓修良的《文史通义新编》，199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钩沉索隐，试图按照章学诚原意恢复《文史通义》本来面目，不仅包括了通行的两个版本中 218 篇文章，而且选录《章氏遗书》和部分散佚的 85 篇重要文章，重新加以编排整理，内篇以《章氏遗书》本为主，增加大梁本多出之篇；外篇编为六卷，前三卷收录驳议序跋书说，后三卷收录方志序例论文；而增补各篇则按类编入各卷之中，成为《文史通义》一个新的版本。另外，对于《校讎通义》的整理，有王重民编定的《校讎通义通解》，于 1987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述整理版本不仅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使用，而且有助于准确地理解章学诚思想广博而深刻的内涵，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关于章学诚史学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对于章学诚史学的研究，二百多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 20 世纪的一百年

中,不仅史学界把章学诚作为关注的热点,发表的论著数量众多,而且哲学、文献学、方志学等领域的学者也非常重视对章学诚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里仅就 20 世纪史学领域里的整体研究成果略为回顾和评介,单篇专题论文恕不一一介绍。

20 世纪前期,我国史学界对章学诚的研究以介绍和宣传为重点,发表的成果多为资料考述。1922 年,胡适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章实斋年谱》的基础上撰成《章实斋先生年谱》,不仅篇幅超过内藤几十倍,而且摘录章学诚论著阐明其思想,考证其事迹和学术交游,集史料解析、史实考证与思想评论于一体。1931 年,姚名达对胡适的著作加以修订补充,撰写出内容更为丰富的《章实斋先生年谱》订补本^①。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的《年谱》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质疑和补正著作纷纷出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孙次舟撰写、吴孝琳署名发表的《〈章实斋年谱〉补正》^②,通过逐年逐条考察,既有纠谬,也有补遗,考订精详,补辑得当。张述祖的《文史通义版本考》^③对大梁本《文史通义》问世后的各种续刻本做了全面考述,指出尚有咸丰年间谭廷献的杭州刻本、伍崇耀的广州《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年间章季真的贵阳刻本、江标《灵鹫阁丛书》中的《补编》本等十几种,这些刻本与大梁本相比不仅有的篇目不同,而且编排次序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孙次舟的《章实斋著述流传谱》^④按照年代顺序谱列章学诚著作流传后世的情况,年经书纬,一目了然,为研究章学诚著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0 世纪中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内地没有产生出研

①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出版。

② 《说文月刊》第 2 卷第 9—12 期,1940 年 12 月—1941 年 3 月。

③ 《史学年报》第 3 卷第 1 期,1939 年 12 月。

④ 《说文月刊》第 3 卷第 2—3 期,1941 年 9 月。

究章学诚史学的代表性论著。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著作是香港学者吴天任所著《章实斋的史学》^①、美国学者尼维森(David S. Nivison)所著《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②和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所著《论戴震与章学诚》^③。可以认为,中国内地对章学诚的研究没有实质性进展。

20世纪后期,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我国学术界对章学诚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专门或比较集中论述章学诚史学的著作,重要的有以下几部。吕思勉著《史学四种》^④一书的《文史通义评》,重点解释和评论《文史通义》内篇某些重要篇章的宗旨和意蕴,对文中较难理解的哲理性问题做出疏通阐释,颇有价值。张舜徽著《史学三书评议》^⑤一书的《文史通义评议》,对其重要篇章加以解析,既有注释和考辨,又有批评和论断,征引广博,见解独到。仓修良著《章学诚和〈文史通义〉》^⑥,系统地研究了章学诚生活的时代及其生平事迹、《文史通义》编著与刊刻、《文史通义》所反映的章学诚思想和章学诚的学术地位等问题,是中国内地学者第一部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专著。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⑦,在《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一书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地揭示与论述了章学诚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史学理论、方志学理论、校雠学理论、谱牒学理论、文学理论各方面内容,对其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做

① 香港东南书局 1958 年出版。

②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6 年出版。

③ 香港龙门书店 1976 年出版。

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⑤ 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

⑥ 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

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出全方位的研究,成为研究章学诚的集大成之作。仓修良、仓晓梅著《章学诚评传——独树一帜的史学评论家》^①,作为“中华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丛书之一,着重从史学家的角度评价了章学诚的贡献与成就。台湾学者林时民著《史学三书新论》^②,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加以比较,认为章学诚的学术见解来源于刘知几和郑樵,同时又进一步改造与扬弃,显示出史学发展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余英时增订的《论戴震与章学诚》在中国内地出版了中文简体字本^③,其中关于章学成的研究不仅分析、探讨了章学诚史学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之比较、章学诚“文史校讎”的内涵,而且论述、考辨和比较了章学诚与戴震、童钰、柯灵乌(一译柯林伍德)之间的关系,给读者诸多启示。罗炳良著《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④,对章学诚史学的理论成就给予了较大分量的论述,其中包括“六经皆史”理论、“史德一心术”理论、“撰述”与“记注”理论以及史学功用、史书编纂、历史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理论,并且把章学诚的理论建树置于整个乾嘉史学的理论总相中加以考察,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吴怀祺主编、王记录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⑤,辟有《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专章,专门考察和论述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除此之外,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十余部中国史学史著作,也都以一定的篇幅论述章学诚史学的内容,推进了这个时期对章学诚研究的深入进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①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② 台湾学生书局 1997 年出版。

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出版。

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⑤ 黄山书社 2002 年出版。

三

20 世纪一百年中对章学诚的研究,探讨的问题非常广泛,积累的论文、论著成果数量十分厚重,这既给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提出今后研究如何深入和突破的严峻问题。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章学诚无疑是一位以阐述理论见长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表现出集理论总结之大成的特征,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理论价值,应当予以重点研究。我认为,章学诚史学在理论上的贡献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水平来看,章学诚史学的某些理论是带有全面总结性的成果,达到了传统史学中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继承元、明两代学者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不仅超出了前辈学者的认识范围,而且给“六经皆史”学说赋予以史明“道”的含义,达到了古代学者认识这个问题的最高水平。他关于“以心术论史德”的理论,不仅继承了春秋时期孔子主张的良史“书法不隐”、唐代史学批评理论家刘知几推崇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思想,关注史家记载历史是否能起到彰善殛恶的借鉴作用,而且继承了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素心说”、明代胡应麟提出的“公心说”,然后继续探讨史家具备褒善贬恶的公心以后其历史认识是否即可完全符合客观历史实际,达到了历代史家关于历史认识论中史家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理论的最高水平。他关于“撰述与记注”、“史法与史意”的理论,是继承汉代司马迁、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等人的思想而来,阐明历史学必须具备撰述和记注两家之书,而史学家修史必须做到心知其意,运用别识心裁,真正达到史学成一家之言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境界。可以看出,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